

# 模糊的文人，相異的實踐

黃順星

---

書名：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

作者：李金銓主編

出版日期：2008 年 12 月

出版社：政大出版社

---

## 《全文》

中國報業的文人論政傳統，一般認為起自 1874 年王韜於香港創辦的《循環日報》。但真正引領風潮、轟動朝野，乃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黨人，於 1895 年甲午戰敗後一連串的辦報實踐，開創出中國文人論政的第一波高潮。

民國成立，1919 年以五四運動為標誌，由「胡適派學人群」為核心所創辦或參與的系列刊物，被視為文人論政的第二次高峰，最具象徵性的報刊為 1941 年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贈最佳報紙的《大公報》。

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由王芸生、徐鑄成、儲安平等第三勢力人士所經營創辦的《大公報》、《文匯報》與《觀察》等刊物為第三次高峰。爾後在中國隨著 1949 年中共建政而湮滅，在台灣雖有雷震的《自由中國》延續，但至 1960 年也告中斷。

這本脫胎自 2007 年 4 月於香港城市大學舉辦：「自由的理念與實踐：民國時期知識份子與報刊」研討會的論文集，正是以上述文人論政的起伏消沈而鋪陳開展的學術論著。連同編者李金銓教授的導論，總計收錄十五篇環繞「文人論政」為問題意識的新聞史相關論文。

高力克教授以伊薩·柏林（Isaiah Berlin）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分，主張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兩大旗手：陳獨秀與胡適兩人在政治思想上的主要分歧。因為兩人對「自由」的不同詮釋，導致日後選擇不同的政治路線。楊琥教授分析《新青年》通信欄的設置與討論議題的變化，探討此一欄目如何形塑五四運動前後的社會輿論，又是如何在讀者與編輯間發揮溝通思想與串連動員的角色。

潘光哲、章清、張太原、陳謙平等人的文章，將焦點集中於「胡適派學人群」創辦《努力週報》與《獨立評論》等刊物時的思想轉折、政治主張的爭論，及對社會輿論、民國政局演變乃至學人從政的影響。

鄭大華、禹江及高瑞泉乃至林淇濤的論文，藉特定報刊（《益世報》、《觀察》、《自由中國》）的內容分析，說明與評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羅隆基、儲安平、雷震）對民主憲政的理解與思想上的特徵。桑兵及黃旦兩位教授，則是探討國共兩黨在中日戰爭時期迥異的媒體輿論策略，前者以協助學人創辦刊物予以攏絡並營造有利國民黨的輿論環境，後者則逐步確立以組織動員為核心理念的黨報理論。

在這本文集中，多數作者憑藉其專業的史學素養，從思想史或政治變遷為切入點，分析不同知識份子的思想與政治主張。這樣的學術研究對後人理解過往知識份子的理念與實踐，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誠如李金銓教授所言：「本書實是歷史學界為新聞史界提供部分補缺」（頁 4）。這顯然是針對中國新聞史學界，忽略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報刊實踐的批評。<sup>1</sup>但如果將問題緊扣該書的副標題：「知識分子與報刊」，顯然這樣的研究取徑就有待商榷。

對本書的多數作者而言，報刊是不同時代思想載體的反應。例如在潘光哲教授的文章裡提到，所以研究《努力週報》是希望：「對《努力週報》的所有論說進行全面的考察，應可為胡適的政論生涯史，提供思想脈絡的解釋。」（頁 83）而在陳謙平教授的文章題旨中也明確地表示：「以當時在《獨立評論》上就『獨裁』與『民主』展開討論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群體為中心，對其在自由理念產生的分歧進行分析，試圖解析在民族危機大背景下自由主義受挫的深層次原因。」（頁 165）。最清楚說明研究報刊內容的意義，出現在鄭大華與禹江的論文裡：「在這場憲政運動中，作為主要的大眾媒體——報紙，為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活動平台。」（頁 188）。

對上述作者來說報刊被視為史料，重點不是報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有何特徵，抑或報刊的編輯體例、欄目版面、寫作格式，如何反應不同時

代的文化或社會背景。報刊所以被討論，是其所刊載的內容而非報刊本身，焦點是誰寫什麼，傳遞那些思想。至於報刊為何刊載、如何編輯文章等問題，在本書中鮮少討論。

## 新聞史研究的主體

1974年，James Carey發表的短文〈新聞史的問題〉，曾引發了美國新聞史研究的轉向。<sup>2</sup>在該文中，Carey（1997）整理分析影響美國新聞史的經典著作後發現，這些主流的美國新聞史研究是基於「輝格式的解釋」（Whig Interpretation）而來的詮釋。

所謂「輝格式的解釋」是將進步理念與歷史發展相結合，視新聞史為個人自由權利，雖然緩慢但穩定的發展。而新聞史的知識就是從政黨報刊到商業報刊的轉型，然後倒退為聳動的黃色新聞，又朝向爬糞與社會責任論演進。其經典表述就是個人權利的擴張，即「知的權利」得到承認的發展過程。簡單地說，在「輝格式的解釋」框架中，假定現代新聞體制與新聞事業的發展，有賴於民主政治——資產階級自由民主體制——與言論自由的確立而得以鞏固。

以「輝格式的解釋」研究新聞史的問題是預設歷史發展的目的，將新聞體制的發展與民主體制的建立畫上等號。在此觀照下，新聞被視為第四階級，而言論自由是防止多數暴政的利器。知識稅、印花稅、報刊登記證等等限制不只妨礙言論自由，更是對個人權利的侵害而必須予以清除。基此，新聞史的存在是作為民主演變的例證，新聞史成為政治發展史的註腳，研究對象（新聞）的能動性不但無足輕重，甚至連研究主體也消失不見。同樣的問題同樣存在於台灣與中國的新聞史研究。

兩岸的中國新聞史論述皆以清末洋務運動引入西方現代報刊為現代中國報業的起點，中間夾帶維新／革命報刊的轉折而跨人民國報刊，再以1949年為分界，依據不同的意識型態而各有偏倚。但中國新聞史的發展始終以「文人論政」、「文人辦報」為主旋律，因政治局勢的開放與不確定而高調唱和，或因權力的恣意妄為而低調噤聲，對近代中國新聞的理解必須依附於政治環境的背景脈絡。

如此一來，中國新聞史研究始終脫離不了以政治的角度看待報刊，而忽略從文體格式、組織型態、廣告收益、資金來源等事關報刊存廢大計的角度，分析不同時期的報刊特徵，更遑論深入探究報刊可能具有不同的社會與文化意義。進而言之，在「輝格式的解釋」中將新聞等同社會建

制，而忽略新聞的文化特徵（Reilly, 1997: 108-109）。但什麼是新聞的文化特徵？Carey（1997）認為新聞是一種意識狀態，是一種理解與經驗世界的方式。當某種報導型態出現，勢必是來自個人對事實的觀察與再現，這些觀察與再現的方式都不斷地在時間中轉變、定義與再定義，這些不同的表達方式對 Carey 來說就是人類意識的產物。同時新聞的寫作方法、編輯程序、採訪規範，也與其作為大眾生產的文化產物及工業需求相關。

以 Michael Schudson（1978）的《探索新聞》（Discovering the News）為例，經由追溯不同年代中新聞的報導類型，探索客觀新聞如何成為當代新聞的專業意識型態。Schudson 認為客觀新聞報導的崛起，背後是整個社會客觀化的過程，亦即從共同體進入現代社會的變遷，我／他者領域的逐漸分化，而促使個人採用客觀化的方式看待世界所致。因此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新聞的「故事取向」被新聞的「訊息取向」替代。Carey 認為一旦接納這種文化取向的新聞史，也就掌握人類想像的特殊形式。更具體地說研究者不應只將新聞當作史料，新聞、報紙本身就是豐富的研究對象，從中可以觀察到人是如何經歷現代性的衝擊。研究新聞史也就是掌握過去特定時段中閱聽人所掌握的實體，新聞史表現特定的時代氛圍、情緒、或想像，而報紙則具體地呈現過往時代的感覺結構。

在本書中，陳建華教授正是採取類似的視角，解讀向來被視為風花雪月的鴛鴦蝴蝶派作家周瘦鵑，在擔任《申報·自由談》主編時發表的文章，如何以通俗文學的方式表現民國時期的都市文化，「家庭版」的文章又如何扮演大眾啟蒙的角色。但這種以文化史甚至接近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解讀民國報刊的研究，在華文新聞史研究領域仍屬鳳毛麟角。研究方法的貧乏，使我們無法進一步地想像並分享由前人所創造，那曾經極為絢爛奪目的文化景致，也無法從中得到更新再生的啟示。

就如李金銓教授在導論中指出的：「民國時期主流報紙，大概有三種典範：民營商業報紙、專業報紙、黨報系統。」（頁 18），其中商業報紙以上海《申報》與《新聞報》為代表，專業報紙以天津《大公報》最為人熟知。就當時的發行情況而言，《大公報》約為三萬五千份僅及《申報》的三分之一，但實際的研究成果卻恰恰相反。正如本文集所呈現的，研究者多將目光集中在象徵「文人論政」的報刊與人物上，分析焦點著重知識份子的言論反應何種思想，或如何以言論影響政局。但報刊從來就不只有一種樣貌，也不可能只有單一的社會文化意義，僅以此分析民國報刊，明顯忽略其他同時代相異的報刊實踐。

## 邊緣化或大眾化

而且就「文人論政」的主體：知識份子來說，在這階段所面臨的是余英時所言「知識分子邊緣化」的過程。換言之，中國傳統士人的認同與角色也正經歷千古所未見的劇變，失去科舉功名庇佑的讀書人必須摸索新的生存之道。與余英時主張中國傳統士人逐漸衰退的觀點相對，張灝認為在這階段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文化影響力相較過去有更大的著墨空間，因為晚清以降陸續出現學校、媒體與社團等有助於形成現代知識份子的制度性媒介。

許紀霖（2008: 7）因而認為：「隨著新式的學堂、傳媒和社團的出現，出現了一個『知識人社會』。這一『知識人社會』居於國家與社會之間，其中的角色不再是傳統士紳，而是現代知識份子，其職業是多元的：教師、編輯、記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限於篇幅與題旨，只能放下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力究竟是增加或減少的討論，而是藉此提醒研究者注意因為現代傳媒的引進，連帶引起傳統讀書人的身分轉變。

簡單地說，傳統中國士人由於科舉制度的實行，在地方鄉里乃至中樞朝政皆保有一定的社會與文化特權，但 1905 年取消科舉後這種制度性的保障也隨之消失。傳統士人必須走入社會另謀出路，新式學堂與現代傳媒成為傳統士人面向大眾的棲身之所。當中有人援引比附將現代報刊視為古代清議，試圖透過報刊影響國政而形成輿論中心。但相對地，同樣也有人因為現代報刊的商業特性，而徹底放棄中國士人的倫理承擔，以迥異於傳統的方式經營其文化生涯。

在陳建華的研究中指明周瘦鵑未曾以知識份子自居，「而自稱為小說家、記者，也一再抱怨自己是一個文字勞工。」（頁 237）。另一位同樣是鴛鴦蝴蝶派的著名作家：包天笑，受狄苞賢邀請加入《時報》筆陣時，首先考慮的是經濟與生涯實踐的問題而非任何沈重的使命問題（李仁淵，2005）。當傳播媒體成為營生謀利的行業時，投入其中的個體勢必存在不同的想像與實踐方式。

法國學者 Regis Debray（1979）就分析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知識份子因其所依存機構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在 1880-1930 年，知識份子與大學形成一個緊密的聯繫，大學不但成為知識份子避難的場所，透過大學提供的講學與言論自由，以及大學本身與國家權力機構的複雜關係，大學成為知識份子主要的活動場所。1930-1960 年代則是由出版社

取代了大學的地位，成為知識份子自我表徵的重要陣地，而各出版社自然也就代表著不同的知識流派與政治立場。但到了 1960 年代特別是 1968 年的五月風暴後，大學與出版社的地位已不再顯著，電視成了表達知識份子身份的場所。

換句話說，「知識份子」會因其所依附的社會體制而有不同的身分想像，而且當中還夾雜著知識份子爭奪文化資本的不同策略。許紀霖(2008: 21) 引用錢穆的觀點，認為中國士紳的影響一在清議，二在門第。到了現代清議演變為公共輿論，門第轉變為學校和文憑，透過知識份子的社團與同仁刊物，在民國時期形成相當顯著的文化權力網路。

對民國知識份子而言，學校文憑成為彼此爭勝差異的文化資本與象徵，在傳媒上所博得的廣大聲名又何嘗不是另一種象徵資本與競爭策略？

「文人論政」的身分認同與實踐固然可敬可佩，但對民國時期投入新式報刊的諸多個體而言，是否能夠一概而論地以具有倫理規範意義的「知識份子」理論分析評價？這當中顯然還存在著許多其他可能，但這顯然並非本書多位作者之不足，而是提示新聞傳播研究社群應當投注更多的心力於此一領域。

除了忽略研究對象——新聞的主體性外，Carey 的批評也指涉「新聞」並非一成不變的實體，而是隨著歷史有不同的意義與展現方式。Jean K. Chalaby (1996) 認為，新聞與其他知識類型一樣，是透過論述實踐而被建構的社會性產物。特別是 19 世紀中後期在美國與英國兩地的發展過程中，新聞逐漸與文學和政治場域產生區隔，目前習以為常、以事實為導向的現代新聞於此時現身。但在同時期的法國新聞，依舊存有強烈的黨派色彩與意見評論。必須要到一次大戰前後，由於英國在國際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倫敦成為越洋電報的主要發散地後，以事實為核心的現代新聞模式才同時伴隨英美帝國主義而擴散至全球。

換言之，在歷史上「新聞」從來就不只有一種面貌，「客觀中立」的新聞觀本身也鑲嵌著歷史與文化印記。以中國為例，對英美新聞模式的仿效，表現於新聞教育的移植最為顯著。張詠、李金銓所收錄的論文，正是分析美國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如何成為中國新聞教育的典範。一方面是美國實用主義的思想切合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需求，另一方面還與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帝國擴張脫離不了關係（頁 347）。這可從中國第一個新聞系所：燕京大學報學系，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中國乃至台灣的新聞教育皆以密蘇里新聞學院為範本中，看到帝國主義的餘緒。但除了教育體制上的複製，報刊實務上又如何以英美為師，在傳遞複製的

過程中我們失去了那些？新創了什麼？對於有心從事新聞史研究者來說，本書提供了意義深長的反思。

## 註釋

- 1 同樣的批判也適用於台灣，例如在曾虛白接近千頁的《中國新聞史》中，關於胡適的索引條目僅有四項。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報刊實踐的研究，無論是早期的《獨立評論》或後期的《自由中國》研究，多數出自台灣的近代史研究學者手筆（如張忠棟《胡適五論》、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等），台灣新聞史研究者也鮮少觸及此一研究領域。
- 2 「新聞史研究的轉向」這個論點來自夏春祥的貢獻，僅此感謝。

## 參考書目

- 李仁淵 (2005)。《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台北：稻鄉。
- 曾虛白 (1989)。《中國新聞史》。台北：政大新聞所。
- 許紀霖 (2008)。〈近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許紀霖 (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頁 1-16。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張忠棟 (1990)。《胡適五論》。台北：允晨文化。
- 陳儀深 (1989)。《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
- Carey, J. W. (1997).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 In E. Stryker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 86-94).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alay, J. K. (1996). Journalism as an Anglo-American inven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and Anglo-American journalism, 1830s-1920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3), 303-326.
- Debray, R. (1979). *Teachers, writers and celebrities*. London: Verso.
- Reilly, T. (1997). Putting the world at peril: A conversation with James W. Carey. In E. Stryker & C.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 95-11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何穎怡譯[1993]。《探索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台北：遠流。)